



十里香

周全胜 /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作 者 像

装帧设计：许康铭

责任编辑：泛 鳧

何程刚

目 录

爱国的心	1
陶妈妈的一家	6
往事象珍珠	10
胸怀	13
爱晚亭前	17
蝶恋花	20
将军与元帅	24
闪光的路	31
雷锋与《茵茵》	35
黄昏颂	37
农会哨	40
十里长街十里香	45
白莲花	49
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	52
鸡年第一声	54
奋进不休的人	56
访书法家周昭怡	59
在雷锋馆	61
她的心永远年轻	63
在求索的山径上	66
他爱写	71
航标灯	73
浪花	76

梁彦这姑娘	79
在荆棘路上	81
他曾经是癌症病人	84
上海来的太极名家	89
李小平的探索	92
武当七星子	95
大戊梁歌会掠影	98
军港一夜	101
希望之光	107
早春的温馨	110
同心树	112
厂长的胆识	114
在书记的心中	118
为了二等公民	121
小巷深处的铁树	125
两位老总	128
雅园的人	135
脚步匆匆	138
舞龙头的人	140
任树铭和他的同行	143
老虎岭上	147
写在劳动节前	150
小溪水	153
任期	156
清风	158
盐之歌	163
后记	165

爱 国 的 心

人到了暮年，总爱打开记忆的仓库，回溯自己走过的道路。尤其是在黑暗中徘徊过许久的人，在经过徬徨、苦痛、斗争之后，终于见到光明，踏上坦途，更是值得庆幸的。

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先生，他叫姜治方，是国民党第一个起义回国的外交官。

三十年前，姜先生是国民党驻波兰最后一任代办。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夕，他设法通过意大利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个秘书，向我人民政府表示起义的诚意。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姜先生在华沙向毛主席、周总理打电报：

“我是国民党驻波兰最后一任代办，我宣布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投靠人民。”

很快，周总理批复回电给他：“同意，欢迎回来。”

姜先生因事在欧洲逗留近两年之后，带着家眷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他来不及拂去身上的风尘，也顾不得消除长途旅行的疲劳，就象久别的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那样，要把故国京都看个够。他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个寒暑，熟悉巴黎古城堡的轮廓、布鲁塞尔尖顶式的教堂、里斯本奇特的建筑物，也领略过大西洋彼岸的风光、波罗的海之滨的景物，然而他并不留恋这些，他一心向往祖国。此刻，他深深地呼吸北京的空气。多新鲜！纵情地浏览首都的新貌，多可爱！湛蓝的天空、如茵的草地、飘香的月桂、待放的秋菊，令人心旷神怡！天坛、白塔、古寺、红墙，令人神往！到处在张

灯结彩，到处是欢歌笑语，人们在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啊！变了，变了，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天晚上，姜先生接到国务院邀请的通知，第二天一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这一崇高荣誉，使他异常兴奋。

他抬头仰望广场上空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肃然起敬。这面灿烂的五星红旗，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召唤着海外一切爱国的人们。他向着这面红旗，来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表示由衷的敬意。

看哪！旗帜的森林、鲜花的海洋、滚滚的铁流、欢呼的人潮……这一切在他心中激起了不平静的波澜。他眼含泪花，喃喃自语：“我终于回来了！”

姜先生回国后，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饭后茶余，他和家人商谈：“还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有益的事呢？”

他的夫人何振惠指着床下两只大皮箱说：“这个未必不行？”

姜先生拍拍脑门心，眼睛忽然一亮：“对！对！这是我姜治方从国外带回的全部财产。”

什么贵重财产有两皮箱？是金银首饰，还是珍珠玛瑙？不是。是现钞巨款，还是情报密件？也不是。

打开皮箱一看，简直是小小的邮票世界，万象缤纷，引人注目。这里有一八七八年清朝发行的我国历史上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有一九〇〇年沙皇俄国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占天津、北京时，在我国领土上开设外国邮局，贴用的外国邮票、信封和明信片，有清朝政府在台湾省发行的邮票；有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发行的邮票；有西藏一九一一年以前发行的邮票；还有不少奇珍、佳品。比如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南京发寄的“实寄封”（实地寄出，盖了邮戳的邮票、信封）一枚，面值为五元，加盖了“中华民国临

时中立”的邮戳，已经成为世界孤品。姜先生为了从巴黎邮商的手中得到这枚实寄封，曾不惜花费二千美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邮票越来越珍贵，可以说价值连城了。姜先生曾以部分邮票，两次参加国际邮展，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在比利时举办的航空邮展上，姜先生以我国一九二〇年发行的五、六十枚“首航封”参加展出，荣获银牌奖。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在葡萄牙举办的国际邮展上，姜先生以一千多枚中国大龙和小龙邮票及十余个大龙和小龙信封参加展出，获镀金牌奖……

回首往事，姜先生发出会心的微笑。然而有一件事使他至今还在兴奋，还在回味，那是抗日期间，法国一个进步组织在巴黎开展览会，介绍我国苏区的情况，已征集到许多照片、地图、书籍、报纸，唯独缺少关于邮政方面的资料。当时在巴黎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周竹安，知道姜先生有赣西南赤色邮政蓝色八分邮票的实寄封和湘赣边省赤色邮票一分实寄封，希望借用一、两个月。姜先生欣然应诺。事后，周竹安告诉他：这两枚展品在展览会上受到很高评价，到会参观的中外人士都称首次见到，大加赞赏。

谈起集邮，姜先生十二岁时就开始了。最初集外国邮票，喜爱好看的大张或三角形的。后来集的多了，需要选择一个范围，就专集中国邮票。他回国之后，继续热心收集革命根据地统一发行的各种邮票，和当时的实寄封。在积极收集我国人民邮政早期史料的同时，还特别喜爱收集研究中国古代邮驿和民间信局的历史资料。说来也凑巧。有一天，姜先生在北京一个胡同小巷的旧货摊上，偶尔发现同治六年的“排单”和“火票”，立即买到手。他经过反复研究，确认我国创办邮政之前，文职衙门传递公文用“排单”，武职衙门用“火票”。沿途驿站要在单

上注明到达时刻，如果包裹擦损物件遗失都要将情节注明。研究这些资料是饶有趣味的，在国际上颇有价值呢！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国际邮展上，姜先生以这张排单和这张火票、十枚中央苏区实寄封、四枚大龙邮票信封参加展出，荣获一等全质奖章和奖杯，为社会主义祖国赢得了荣誉。

喜讯传来，全国邮票发行局局长王安国首先打电话给他表示祝贺。接着，田汉、夏衍、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还有北京戏剧学院教授周贻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等老友新朋纷纷向他致贺。日本集邮协会会长水原明窗、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也到他家作客，观赏他的邮集。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姜先生，你已成为了国际新闻镜头人物。现在新华社要向国外发稿，请允许我为你拍照。”这一年第三期和第八期的《人民画报》，连续报道了姜先生的集邮活动。

在荣誉面前，在欢乐的时刻，姜先生想起和夏衍同志的一次交谈。那是一九五三年秋，夏衍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姜先生家里作客，看了姜先生的邮集后，说：“中国士大夫只知道收集书籍字画、古董玩器，而不知集邮。集邮活动最初在欧洲兴起，后来传入中国，加之中国的邮务长一直是法国人担任，收集中国邮票，在国外倒比国内容易。老姜能这样丰富地把中国邮票、实寄封、明信片的珍品收集回来，这对国家是一个大贡献。老姜的邮集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可观。集之不易，希望不要再分散了。”

姜先生当即表示：“决不再分散，今后都统统捐献给国家。”

想到这些，姜先生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似乎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向前……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春天，姜先生终于无私地将自己一生集的珍贵邮票、邮政文物

资料和中外集邮书籍、杂志捐献给国家，满满五大箱啊！

姜先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邮电部在湖南大学举行授奖仪式，发给姜先生奖状和奖金五千元，赠送新中国全套邮票两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姜先生得奖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十几万字的《集邮六十年》，正在报刊连载。姜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还有些不适，然而他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爱国不分先后，贡献不论大小，只要有这颗爱国的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陶妈妈的一家

在一座幽静的庭院里，株株常青树冲风冒雪，郁郁葱葱，象神圣的卫兵守护在那里，不知名称的花儿，正舒枝展叶，含苞育蕾，报告着春天的喜讯。

革命老妈妈陶承就住在这所庭院里。

几年来，不少读者都在询问：“她还活着吗？她一家人呢？”

她，是怎样牵动着人们的心绪啊！

为什么陶妈妈这样受人敬重，令人怀念？因为她为革命曾献出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她写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曾给我们莫大的教育和鼓舞，湖南省花鼓戏剧团把它改编成花鼓戏，根据它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长沙的许多单位，请过陶妈妈的儿子欧阳应坚作报告、讲故事……

尽管时间流逝了二十多年，留在人民心中的美好记忆却是永存的。万万没想到，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大人物”，把亿万群众喜爱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诬陷成“为王明路线歌功颂德”的大毒草，对陶妈妈残酷迫害。她在七十六岁时竟被捕入狱，八十一岁时才出狱，坐了五年半牢。越是想到这一切，就越渴望着快点见到陶妈妈。

当我们走进庭院，不由得把脚步放慢，放轻。刚进屋，就听见里面笑语喧哗。啊，原来陶妈妈和屋里人正围炉向火说说笑笑呢。我刚说明来意，她听出我的口音，问我们是不是长沙人？我回答后，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是地地道道的长

沙人，对吧？”说完，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外孙女庆元、小文。小文没做声，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里只是笑，庆元是位美丽的女青年，说起话来含羞带笑，在快活的祖辈面前，故意把话音拉长：“是一一的，外婆！”顿时，房子里又是一片笑声。

“来来，吃糖，吃糖。”陶妈妈说着，挨个给我们递糖块，“瞧我这只手，有些麻木了，想写几个字，也不听指挥了，一横，就横到太平洋，一撇，就撇到大西洋。”她边说边比划着，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她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此热情、风趣、乐观，使我们一来到她的跟前，立即感受到幸福和温暖。此刻，又有谁相信她曾经有过忧愁和哀痛，差点被迫害致死呢？！

“庆元，把相集拿来，在大柜中间那个屉子里。”

旁边的人告诉我：“陶妈妈还保持着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习惯，东西搁在哪，都记得清清楚楚。”

陶妈妈指着相集说：“这是电影演员于蓝同志送给我的。没想到这本相集也跟着我坐了好几年牢！”

我们打开相集，里面有陶妈妈年轻时全家的合影，有她儿子立安、稚鹤的遗照，有她丈夫安葬在长沙南郊的墓场外景……这一幅幅珍贵的照片，都是陶妈妈一家干革命的见证。可是一夜之间，却曾被当成黑材料搜走了。

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的傍晚，一辆神秘的小车突然“请”走了陶妈妈。第二天上午，她离开长沙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投进监狱。又是搜身，又是审讯，翻来覆去就问这些：“《我的一家》是谁叫你写的？”“中央都有谁到你家去过？”

饱经风霜的陶妈妈在痛苦地思索着：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共产党员穿的是囚衣，三天放一次风，七天半月过一次堂，吃喝拉睡一间房。这是为什么？难道

仅仅是为了这薄薄的一本书？不是。分明是追查这本书的人心中有鬼！一定是党内出了坏人！

她凭着对党多年的感情和坚定的信仰，坚持着，斗争着。五年半的铁窗生活，进一步磨砺了她的意志，也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病倒了！

那些人怕她死在北京，不好交差，就通知她儿子应坚来领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陶妈妈由公安人员押送回长沙，一路上她昏迷不醒，身边放着氧气瓶。

应坚看到母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一阵阵绞痛。母亲坐牢，全家竟成了“反革命家属”。应坚这位忠诚老实的好干部，也因此湖北黄石挨批斗、挂黑牌、扫厕所，整整三年不能回长沙和亲人见一面；孩子们上大学、当工人、入伍参军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当陶妈妈慢慢苏醒过来，看到儿子应坚和孙儿孙女站在床前，才发现自己回到家中，不由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时，她多愿见到生活在武汉的女儿欧阳本玫和她的一家啊！可是，陶妈妈万万没有想到，从前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女儿也和自己同一天被捕，同关在北京的一间监狱，又是同一日坐同一趟列车被押送回长沙。本玫一家正因这些缘故，早已被迫从武汉迁到桑植落户。眼下，本玫急切地想见见年迈的母亲，又担心母亲受不了新的打击。

陶妈妈当天见到本玫后，精神也好多了，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爱和恨！

两个寒暑过去了，陶妈妈仍然卧床不起。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于是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是寄邓颖超同志转的。不到二十天，周总理派来四位同志，为陶妈妈恢复党籍、恢复干籍、恢复老干部待遇、恢复原工资级别，还补发了

坐牢期间的全部工资。陶妈妈多么感激我们伟大的党啊！她感情真挚地对我们说：“那时，我们敬爱的总理正在病中哪！”陶妈妈一次就交了两千元党费。她认为在狱中吃饭也要付钱，又付了两千元伙食费。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事情啊！

十月的阳光驱散了阴霾，陶妈妈神情矍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如今虽站不起来，但能安祥地坐在椅子上，听儿孙们谈论好消息。读者曾经询问我们报社的同志：“欧阳应坚在哪里？”现在可以告慰大家：应坚同志已经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职务，在湖北黄石十五冶总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正和工人们一道为实现“四化”作贡献。除了他的小儿子在长沙市五中读书外，其余五个孩子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大儿子欧阳为立去年还考取了湖北医学院。欧阳本玖一家人原先受到株连，现在都心情舒畅地为人民工作着。

一谈到孩子，陶妈妈格外兴奋。她扳着指头激动地对我们说：“在旧社会我生过六个孩子，牺牲两个，夭折两个，只剩下两个；如今我有六个孙，七个外孙，还有重孙重外孙，已经是四代人了！”

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为陶妈妈一家人祝福，并祝她老人家长寿。陶妈妈乐呵呵地说：“人家说我今年八十六岁，不止了，我甲午生的，今年三月满八十七哩！”

外孙女小文向姐姐庆元眨眨眼睛，庆元满面春风地朝外婆说：“八十六岁还不好？又年轻了一岁嘛！”

“好，好，好，我又年轻一岁罗！”陶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是呀，尽情地笑吧，喜讯正多着哩。你看！《我的一家》重新出版了，《革命家庭》重新上映了。象陶妈妈这样的家庭，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千千万万。他们是任何邪恶势力欺骗不了的，扼杀不了的。因为真理和正义永远在他们身上！

往事象珍珠

往事，有时象过眼烟云，匆匆而去；有时象珍珠宝贝，藏在心灵深处。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走访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李金莲同志。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朴实无华，耳聪目明。她摇动着记忆的小船，在心灵的海洋摘取珍珠，一颗颗，一串串，晶莹玲珑……

老百姓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正准备交公粮，一个中年农民不满地说：“公粮交这么多，我们吃什么？毛主席要遭雷打。”

当地的干部一听，那还了得，赶紧把他抓起来，押到延安。

毛主席知道后，向前来汇报的干部说：“我有错误，他才骂我嘛！明天请他上我家里来。”

第二天，这个农民走进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连忙递烟给他，请他坐下，并问他：“你什么事到这里呢？”

“我骂了你，要杀就杀，反正我是老百姓一个。”

毛主席又端杯茶给他：“我也是个老百姓呀，没有老百姓，哪来的革命队伍？来，喝口水，慢慢说，你为什么要骂我？”

这个农民一仰头，喝完茶，说：“反正我是死罪，说实话吧。交公粮给政府是应该的，可现在越交越多，我们当农民的

负担太重，还吃什么？你当主席，不负责，我就骂了你。”

毛主席温和地笑着说：“你骂我，骂得对，这一骂，我就晓得哪些政策有问题，要改一改。”

不久，党中央作出决定，这一年征购公粮的任务减少了二十万担，边区农民喜笑颜开。

李金莲讲到这里，说：“当时我在延安学习和工作，听到这件事，觉得毛主席做得真对。如今有的干部却不是这样，听不得批评，光要人家奉承，这怎么行？会脱离群众的啊！”

普 通 饭

一九六一年夏天，李金莲到朱老总和董老家里作客，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李金莲对康克清同志说：“康大姐，我想见见毛主席。”

康大姐笑容可掬：“那好办，哪天吃普通饭时，我们一道去。”

吃普通饭是周总理提议的。他说：“现在全国过苦日子，好多人得水肿病，我们也要吃普通饭，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主席同意。于是，在中南海新设一个普通食堂，规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同志，每星期到普通食堂吃一至两餐普通饭。

李金莲到普通食堂稍为晚了点，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吃完饭走了。快到食堂门口时，少奇同志走过来了。他笑着问朱老总、康克清同志：“这是哪来的客人？”

康大姐介绍说：“这是湖南来的，也是参加过长征的。”

少奇同志亲切地对李金莲说：“到我家里去。”王光美同志拉着她的手，指着前面：“就是那幢。”

朱老总笑着朝大家摆摆手：“先吃饭吧！”

李金莲走进食堂一看，饭桌上摆着一碗碗蒸熟的红薯。中央领导同志就座以后，有的用筷子夹红薯，有的干脆用手抓，

吃得津津有味。

李金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和朱老总、康大姐同桌吃红薯，朱老总把碗里剩下的一小块红薯皮也吃光了。

兰花与野菜

在北京香山山麓，有一个小小的兰花园，园中种植着国内外两百多种兰花，清香四溢。在这些名贵的兰花中，却生长着一些野菜。

李金莲从园丁那儿得知，这些野菜是朱老总再三要求保留下来的。

有个星期天，风和日丽，朱老总、康大姐带着小孙子，提只竹篮，和李金莲一起去兰花园扯野菜。朱老总兴致勃勃，讲长征过草地吃野菜的情景，李金莲情不自禁地唱起四川民歌《苦麻菜》，朱老总边听边扯，笑逐颜开，不时地教小孙子辨认兰花中的野菜，哪些可以吃，啊些不能吃，一下子就扯了满满一篮。他语重心长地对孙儿说：“你们拿回去吧，这些野菜是爷爷奶奶当年长征时吃过的！”

李金莲回到总司令家里，看到他家里的野菜放在水缸里全是生的，好奇地问：“这样搞不会烂？”

朱老总幽默地说：“吃到肚子里烂去。”

吃饭时，朱老总叫大家夹着野菜在开水里烫了吃，他见李金莲吃得很香，就笑着问：“你那么爱吃，知道这是什么？”李金莲摇摇头：“不知道。”

朱老总慈祥地说：“这是菊花瓣，你看，比长征路上的野菜怎么样？”

李金莲点点头：“好吃得多了！”